蔡元培（1868年-1940年）

评价

蒋介石在日记中评价他：“惟其在教育上与本党主义之功罪而言，以吾所见者，但有罪过而已，尤其是教育受其乡愿式之影响为更恶劣也。”

毛泽东在唁电中赞誉其为“学界泰斗，人世楷模”。

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：一曰，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；一曰，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。此两种文化，具其一难，兼备尤不可觏。先生殁后，此两种文化，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!（傅斯年《我所景仰的蔡元培之风格》）

林语堂《记蔡孑民先生》：“谁也知道，那时的北大是全国思想革命的大本营，而北大之所以能够如此，是在蔡先生主北大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的政策。那时的北大前进者有胡适之、陈独秀、钱玄同、刘半农等，而全国思潮的潮流交替，就在北大自身反映出来。”

一般他说来，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不可的老好人；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，都很倔强地坚持着，不能通融，虽然态度还很温和；这是他老先生令人佩服的第一点。自戊戌政变以来，蔡先生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运动，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长时，对于守旧的陈汉章、黄佩，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，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，都因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，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属罕有；这是他老先生更可令人佩服的第二点。陈独秀：《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》，1940年3月24日重庆《中央日报》。

美国教育家杜威：“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，牛津、剑桥、巴黎、柏林、哈佛、哥伦比亚等等，这些校长中，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，固不乏其人；但是，以一个校长身份，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、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，除蔡元培外，恐怕找不出第二个。”

关于蔡先生的兼容并包之量，时下论者多能言之，但我愿指出的是：蔡先生除了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 以外，更重要的乃在他的天性上有多方面的爱好，极广博的兴趣。意识到此一需要，而后兼容并包，不免是人为的（伪的），天性上喜欢如此，方是自然的（真的）。有意的兼容并包是可学的，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。有意的兼容并包，不一定兼容并包的了；惟出于真爱好，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，而后尽管复杂却维系得住——这方是真器局，真度量。（梁漱溟《纪年蔡元培先生》）

先生日常性情温和，如冬日之可爱，无疾言厉色。处事接物，恬淡从容，无论遇达官贵人或引车卖浆之流，态度如一。但一遇大事，则刚强之性立见，发言作文不肯苟同。故先生之中庸，是白刃可蹈之中庸，而非无举刺之中庸。先生平时作文适如其人，平淡冲和。但一遇大事，则奇气立见。“杀君马者道旁儿，民亦劳止，讫可小休。”这是先生五四运动时出京后所登之启事。先生做人之道，出于孔孟之教，一本于忠、恕两字。知忠，不与世苟同；知恕，能容人而养成宽宏大度。（试为蔡先生写一篇简照，蒋梦麟）

黄炎培：“盖有所不为，吾师之律己也；无所不容者，吾师之教人也。有所不为，其正也；无所不容，其大也。”

**~28岁求学生涯 至翰林院编修**

1868年（同治）1月11日（农历十二月十七日）生 生日大，虚岁比实岁大2岁

1872年，六岁入塾

十四岁到十七岁，受业于王懋修（字子庄）四年，思想上受到业师很大影响。

王懋修经常阅读宋明理学的书，对于明儒，他最佩服刘蕺山，自号其居约“仰蕺山房”。据蔡元培回忆，王先生“尤佩服吕晚村先生，把曾静案也曾详细的讲过”。

“绍兴在清代，受乡贤刘蕺山先生的影响，气节及理学的风气，深入于知识分子中间，在学术方面，述宋儒的绪余，把知和行打成一片。”

他自述“**孑民20岁以前，最崇拜宋儒**”

1883年，十七岁，考中秀才，结束十年私塾生涯。他在自述中说考过两次。

1885年，十九岁，第一次赴杭州乡试未中

1888年，二十二岁，赴杭州乡试未中

1889年，二十三岁，赴杭州应**恩科**乡试中举（清代于寻常例试外，逢朝廷庆典，特别开科考试，也称“恩科”），列第二十三名，主试为李文田（清代书法名家）

1890年，二十四岁，进京会试，中式为贡士

1892年，二十六岁，进京补应殿试，录为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，授翰林院庶吉士，本年主考大臣翁同龢

1894年，二十八岁，应翰林院散馆考试，升任翰林院编修

**28~32 任职翰林院**

1898年，三十二岁，戊戌变法失败，感到清政府已“无可希望”，遂请长假，携眷返归绍兴。弃官从教。

**古有秀才造反，未闻翰林革命**

（北大学者张寄谦《辛亥革命时期的蔡元培》）：“投身辛亥革命，是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先驱蔡元培一生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转变，也是他终生历史中最难能可贵的一页”。“**纵观晚清数十年间，以名翰林而毅然抛弃前程、背叛本阶级、投身推翻清朝的革命，以后又能毕生坚持爱国事业的，仅蔡元培一人而已。**”

1904年，三十八岁，在上海发起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，任会长。

1905年，三十九岁，同盟会成立，光复会并入。孙中山委任他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。

1917（51岁）~1927（61岁） 北大校长

“大学是研究学问的机关”。亲自主持北大工作的5年间，每学年开学典礼的重要演讲中，他都不厌其烦，总要说一遍。

1918年9月20日：““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，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，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。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，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。”

1919年9月20日：“诸君须知，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文凭的机关，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，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。所以，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，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，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。”

兼容并包。

1918年11月10日，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。

大学者，囊括大典，网罗众家之学府也。

1927年~

蔡元培“独立教育”的主张和国民党政府的党化教育政策格格不入。

1927年，筹办中央研究院，1928年，任首任院长，直至1940年3月去世。

中研院：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，1949迁往台湾地区。

有人评价这是“蔡先生对于我国学术之最大贡献”。（王云五《蔡孑民先生的贡献》）

自此“赛先生”终于在这个东方古国有了安身立命的固定场所。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。

1932年12月，与宋庆龄、杨杏佛、林语堂等发起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”。任副主席。

12月 30日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，蔡元培在会上发表演说，他说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服务宗旨是保障人权，“既同是人，就有一种共同应保障的普通人权。所以，我等第一，无党派的成见，”第二，“无国家的界限，”第三，“对于已定罪或未定罪的人，亦无甚区别。”

1933年6月，杨杏佛被暗杀。

“**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**”《蔡元培自传》

即使参政，主要精力还是在投入在教育、科学、文化方面。

他与知识分子群体合作共事颇得心应手，而应对复杂的政治局面则不然。

辜鸿铭有一段幽默的自嘲：“蔡元培和我，是现在中国仅有的两个好人，我不跟他同进退，中国的好人不就要陷入孤掌难鸣的绝境吗？”?有人问“好人”作何解释。?他很从容地说：“好人就是有原则！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，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，到现在还革命。我呢？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，到现在还保皇。这种人什么地方有第三个？”

1935年7月26日，胡适致罗隆基信中：

依我的观察，蒋先生是一个天才，气度也很广阔，但微嫌过于细碎，终不能“小事糊涂”。我与蔡孑民先生共事多年，觉得蔡先生有一种长处，可以补蒋先生之不足。**蔡先生能充分信用他手下的人，每委人一事，他即付以全权，不再过问；遇有困难时，他却挺身负其全责；若有成功，他每啧啧归功于主任的人，然而外人每归功于他老人家。因此，人每乐为之用，又乐为尽力。亦近于无为，而实则尽人之才，此是做领袖的绝大本领。**